

大学研究型课程专业系列教材

总主编 陈谦平

· 历史学类 ·

中国古代史研究导引

范金民 等 编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南京大学人文基金项目

大学研究型课程专业系列教材 总主编 陈谦平

· 历史学类 ·

中国古代史研究导引

范金民 等 编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史研究导引 / 范金民等编著. — 南京 :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5

大学研究型课程专业系列教材. 历史学类

ISBN 978-7-305-07615-2

I. ①中… II. ①范… III. ①中国—古代史—研究—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K2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87264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 版 人 左 健

丛 书 名 大学研究型课程专业系列教材·历史学类

书 名 中国古代史研究导引

总 主 编 陈谦平

编 著 范金民 等

责任编辑 干有成 编辑热线 025-83594071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京新印刷厂

开 本 787×960 1/16 印张 31.75 字数 640 千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07615-2

定 价 58.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大学研究型课程专业系列教材

顾 问

[学校按拼音顺序排列]

北京大学	钱乘旦
复旦大学	吴景平
华中师范大学	马 敏
吉林大学	林 沅
南开大学	陈志强
天津师范大学	侯建新
厦门大学	陈支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	王 巍
中山大学	陈春生

序

陈谦平

历史既是对人类社会过去发生或经历事情的记载,也是一门研究人类社会运动发展过程的学问,“它包括历史过程的记录,历史经验的总结,历史规律的探讨和历史发展趋势的预见”等四个层次。^①“前者是史事,后者是史学;有关前者的理论是历史理论,有关后者的理论是史学理论”。^②

由于过去的历史已经不复存在,所以人们通常只能通过前人对当时生活与活动的记载来了解那个真实和客观存在的历史。对于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期,考古发掘就成了认识人类社会早期生活的重要手段。那么,后人仅凭考古和文献资料就能够还原出人类社会运动发展的全过程?谁能确定我们对过去事情的记载或叙述是历史真相?何兆武先生认为,人类对于历史的认识演进,受到三方面条件的制约:一是新材料的发现;二是已往的历史事实并非就已经死去了,它们在尔后的历史发展中仍然在起作用,我们往往不能就其本身,而是要根据它后来的历史效应来理解它、评说它,所以“盖棺论定”不能成立;三是由于受到研究者思想认识的限制,史家永远不可能超出自己的思想之上和感受能力之外去理解历史。^③

人们对于历史存在不同的认知。

传统的实证主义历史观认为:历史是客观的,历史研究的目标是寻求历史真相,客观地复原真实的历史。实证主义学派代表人物是德国历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他认为“历史是怎样发生就怎样叙述”,也就是不带主观价值的“如实直书”。兰克甚至不赞成历史的教育作用,认为历史学家不应当存有任何实用的目的,只追求历史真相,不褒贬是非。^④兰克坚决反对“根据某种理论或抽象原则概括历史”,认为“史学家的理论前提和主观意图只能妨碍史学家说明事情的真实情况”。^⑤

① 葛懋春、谢本书主编:《历史科学概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4页。

②③ 何兆武:《诗与真——历史与历史学》,《历史学家茶座》第8辑,2007年6月。

④ 那思陆:《法史学的传承、方法与趋向》,2004年7月30日法律教育网。

⑤ 侯树栋:《20世纪西方史学对兰克史学的批判与继承》,《史学月刊》1999年第2期。

中国古代史研究导引

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认为:根本不存在客观的历史,所有历史都是主观构造的历史。历史真相无法寻找,更不可能完全复原真实的历史。后现代主义学派代表人物是美国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他认为历史学家获得了一系列分散而确实的历史事实,进一步的工作是将这些历史事实由点连成线,进而组成平面,甚至立体空间,这时就需要历史学家的想象。他认为“现代史学在理论认识上的落后已经令它陷入一种荒谬之境”,他指出,一方面是“一群观念保守并毫无社会责任的史学家,沉迷于资料,无视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艺术家对历史的敌意在于历史总是那么缺少敏感性和意志。他认为历史学应该介入现实,用建构主义的方式重新思考历史学的本质。^①

建构主义历史观认为:任何历史资料对历史面貌的反映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它不可能把历史的本来面貌原封不动地呈现出来。历史研究可以不断地接近真实,但永远无法真正达到真实的原貌。既然如此,就某一个历史问题下一个定论,或“盖棺论定”,然后把这个定论以教科书的方式灌输给学生,实在没有科学性。

这里涉及到历史学科的大学教材建设问题。我们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历史课程模式?我们应该让学生阅读什么样的教材?是向学生灌输我们在某种特定的理论模式或政治框架下撰写的教科书,还是引导学生去大量阅读他们感兴趣的基本史料,教会他们用各种史学理论、史学方法和多元的视角去进行观察、分析?我想,后者无疑更科学、更艺术。

正如何兆武先生指出的那样:“一切历史和人们对历史的体验(历史学)都要由历史学家的人文价值的理想来驾驭。在这个意义上,每个史家首先都是历史哲学家。历史学的对象(比如说史料)是一堆建筑的原材料,历史学家则以自己的哲学和理想、依据自己的心中的蓝图,把这堆材料建构成一座大厦(史学体系)。”^②让历史回归学术,让学生阅读更多的史料,让学生用多元的视角去观察历史,让每个学生都成为历史哲学家,这样历史才能丰富多彩,鲜活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这就是我们编写这套教材的目的。

本套教材的编辑和出版,得到由光华教育基金会和南京大学共同出资成立的南京大学人文基金的鼎力支持,在此谨表示衷心感谢。

① 陈新:《历史·比喻·想象:海登·怀特历史哲学述评》,《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2期。

② 何兆武:《诗与真——历史与历史学》,《历史学家茶座》第8辑,2007年6月。

前 言

本卷研究导引的编撰,旨在增加本科生历史知识的广度和深度,提供历史研究的各种路径、选项和方法的参照,引发学生的历史意识和时代感觉。

中国古代史内容宏富,影响深远,自夏商周三代至清代前期,循着一条主线不断发展,而每个阶段又自成特点,不可或缺,构成中国历史辉煌灿烂的篇章。自秦始皇统一中国,虽然时有分合,但国家统一、民族自强观念日益深入人心,根深蒂固。直至18世纪后期,面临西方世界的挑战,如乾隆皇帝明确所言,“天朝尺土,皆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画界分疆,各有专属”,民族融合、民族团结、民族自强成为中华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心声和中华民族不断向前的不竭动力。屹立于民族之林的中华民族,从此催生出日益发达的皇帝制度和官僚制度,历时逾一千三百余年的堪称公平的科举考试选入制度;长城的修筑,长安与北京等京城的营建,运河的贯通,海道的开辟等大型工程,北宋《太平御览》等四大书、明代《永乐大典》、清代《古今图书集成》与《四库全书》等宏大文化工程,都是超前轶后、气势恢弘的盛举,有些堪称世界之最;传颂千古的西域丝绸之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郑和下西洋,中国先后从陆路和海上两大通道发展对外文化交流;天文测量、地震测定长期走在世界前列,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等造福全人类,中国古代历史在世界文明史上从而居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中国古代史学向称发达,体裁多至二十余种,研究手段更是繁复多样。客观真实、秉笔直书,是史家的基本原则,才、学、识三长成为史家的必备素养,而考据、词章与义理,构成中国史学方法的三要素,历代史家或求三者完美结合,或者专擅于某一方面有所突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成为历代史家治史之最高境界,其成果堪称浩繁,而又与时俱进,历久弥新。20世纪以来,随着西方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近代学科知识的引进与运用,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的运用,中国史学研究的方法更加多样,历史之文献与地下之文物双重证据,中国之材料与域外之记录相互印证,使得中国传统社会的面貌更加多姿多彩,帝王将相之外,人民大众的生活史也日益增加了分量,中国史学理论更加蔚为大观,精彩纷呈。

本卷依照历史时代的发展线索,以时代为限,分为十章,选录或节录近现代以至当代著名学者关于中国古代史研究的论文46篇,只要开拓了研究领域、标新了研究课题,或者能够推陈出新,多所发覆,或者方法可称,启人心智,或者涵盖了某一方面,

中国古代史研究导引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均在选录范围之内。

各章结构,则依循本系列专书的统一体例。每章前冠以“导论”,简要综述各个时代的发展脉络及其特点。每篇选文前有“导言”,主要介绍作者,简论所选论文的要旨、特点与价值,同时简述该文所述之相关背景,以起导读作用。选文后的研究与思考,旨在引发学生进一步思考,培养并提升学生对于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能力,其中“延伸阅读”部分,列出若干篇与选文相类或相近的论文篇目及出处,供学生阅读参考,兼以弥补选文涵盖面之不足,“问题与思考”,列出若干研究课题,供学生自习、讨论与研究,以启发其研究思路。

本卷选文及相关章节的撰稿人是:第一、二、三章,颜世安;第四、五章,胡阿祥;第六、七、八章,杨晓春;第九、十章,范金民。

编者谨识

目 录

第一章 文明起源与夏商周三代	1
导 论	1
选 文	5
中国文明的起源(夏 鼐)	5
商周神话与美术中所见人与动物关系之演变(张光直)	17
诸子天人论导源(傅斯年)	31
共同的西周经历(李 峰)	36
延伸阅读	44
问题与思考	44
第二章 春秋战国时代	45
导 论	45
选 文	49
说儒(节选)(胡 适)	49
春秋时代的政治与社会(雷海宗)	58
战国时代的政治与社会(张荫麟)	66
战国军功官僚集团的性质定位(杨师群)	77
延伸阅读	86
问题与思考	86
第三章 秦汉时代	87
导 论	87
选 文	91
汉朝的对外关系(余英时)	91
汉代农业分析(许倬云)	96
论轮台诏(田余庆)	101
英雄与名士(贺昌群)	119
延伸阅读	131
问题与思考	131
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时代	132
导 论	132
选 文	135
汉魏之际封建说(节选)(何兹全)	135

《晋书·赵至传》中所见的曹魏士家制度(唐长孺)	142
述东晋王导之功业(陈寅恪)	146
东魏北齐政治上汉人与鲜卑之冲突(缪 钺)	159
魏晋南北朝史学与王朝禅代(周一良)	170
延伸阅读	177
问题与思考	177
第五章 隋唐五代时代	178
导 论	178
选 文	182
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内藤湖南)	182
唐之府兵及弘骑(岑仲勉)	187
唐代的科举制度(王仲荦)	196
唐人习业山林寺院之风尚(节选)(严耕望)	204
冯道——官僚的最高典型(范文澜)	210
《瘞鹤铭》之谜(卞孝萱)	213
延伸阅读	221
问题与思考	221
第六章 宋 代	222
导 论	222
选 文	224
论宋太祖收兵权(聂崇岐)	224
“黄龙痛饮”考释(邓广铭)	236
关于北宋乡村下户的差役和免役钱问题(朱瑞熙)	243
南宋海外贸易收入及其在财政岁赋中的比率(郭正忠)	253
延伸阅读	264
问题与思考	264
第七章 辽西夏金时代	265
导 论	265
选 文	267
辽代四时捺钵考五篇·四时捺钵总论(傅乐焕)	267
论西夏使臣的“蕃号”问题(白 滨)	281
猛安谋克制的制定及其发展——太祖、太宗时代(三上次男)	294
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刘浦江)	304
延伸阅读	323
问题与思考	323
第八章 元 代	324
导 论	324
选 文	326

蒙古答刺罕考(韩儒林)	326
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杨志玖)	344
耶律楚材、刘秉忠、李孟合论——蒙元时代制度转变关头的三位政治家 (陈得芝)	349
元朝的统一与统合:以汉地、江南为中心(萧启庆)	373
延伸阅读	389
问题与思考	389
第九章 明 代	390
导 论	390
选 文	393
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梁启超)	393
周忱的赋役改革和财政改革(节选)(伍丹戈)	400
个别手工业部门中所见到的资本主义萌芽(节选)(许大龄)	406
东林学派的经济思想和经世致用的求实精神(节选)(洪焕椿)	416
明清江南市镇的专业化分布格局(节选)(樊树志)	424
延伸阅读	433
问题与思考	434
第十章 清 代(鸦片战争前)	435
导 论	435
选 文	439
清世宗夺嫡考实(王钟翰)	439
论清代人事回避制度(韦庆远)	450
“摊丁入地”的意义(节选)(郭松义)	463
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吴承明)	470
论改土归流的进步作用(节选)(张捷夫)	483
清代学术思想特色简论(节选)(王俊义 黄爱平)	488
延伸阅读	494
问题与思考	495

第一章 文明起源与夏商周三代

/ 导 论

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旧史传说有黄帝炎帝、唐尧虞舜,下接夏商周三代,五千年文明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20 世纪上半叶,考古学引进中国,一个重大成就是发掘了河南安阳的殷墟文明。现在世界史公认的四大古代文明,为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约公元前 3500 年)、古代埃及文明(公元前 3000 年)、古代印度文明(公元前 2500 年)和中国的殷墟文明(公元前 1500 年)。(还有一说是六大古代文明,加上美洲的墨西哥文明和秘鲁文明。)殷墟的文明为商后期文明,已经比较发达,说这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显然不妥,在此之前必有更早的文明。(参阅选文部分《中国文明的起源》)20 世纪下半叶的考古发现,已经确定多处早于殷商文明的文化遗址。有郑州二里岗文化,时间测定约为公元前 1750 年至前 1350 年左右,是早期的商文化。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时间测定约在公元前 1900 年至前 1500 年左右,分早期(1、2 期)和晚期(3、4 期),晚期已进入文明的阶段。此外还有大量更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1980 年代,有考古学家将已发现的新石器文化划分为六大区系:燕山为中心的北方区,山东为中心的东方区,关中、晋南、豫西的中原区,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区,环洞庭湖至四川盆地的西南区,鄱阳湖至珠江三角洲的南方区。(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北京三联出版社,1999 年,第 41~85 页。)新石器时代不同区系的文化与安阳殷墟文明之间是何关系,现在还有许多联系的环节没有弄明白,有待考古学进一步研究。大概北方的三系是后来商文明的主要源头,长江流域的三区对华北文明影响较小。

夏文化的考古学发掘,是古代文明起源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黄炎二帝,唐尧虞舜,或有较多的传闻色彩。商代以前有夏,夏商周三代前后相续,古籍言之甚多,学界大都相信夏王朝是真实存在的。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考古学界根据古籍中所记夏代区域,在河南中西部、山西南部等地多次进行有计划的挖掘,半个世纪以来已有较多收获。现在考古学上的夏史研究,关注的中心在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以河南偃师二里头村遗址最典型,分布于豫西、晋南一代,与古籍所记夏史范围相吻合。时间测定在公元前 19 至前 16 世纪,也与史书所记商以前夏王朝年代相合。二里头遗

中国古代史研究导引

址发现有近一万平方米的大型宫殿基址,有青铜器、玉器,还发现一些陶片刻画符号,有学者认为可能是文字。这些情况使部分学者推测该遗址可能就是夏代的文化。尽管如此,疑问仍然很多,能证明与夏有关的直接证据尚未发现,这一问题目前仍不能下结论。此外,河南封登王城岗发现的文化遗址,也有学者推测为夏都阳城,但多数考古学家认为不宜早下结论。总之,对于夏文明的研究,以及对于古代文明起源的研究,20 世纪的考古学已经作出很大成绩,但是仍有不少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

商代的历史,现在学术界已有比较确切的了解。《史记·殷本纪》记载了商自开国之君汤至亡国之君纣的全部商王系谱,已经得到甲骨文的证实。据《殷本纪》记载,商王曾经五次迁都,汤克夏定都于亳,其后中丁迁囂,河亶甲迁相,祖乙迁邢,南庚迁奄,盘庚迁殷。商人迁殷以后一直定都在那里,直至帝辛(纣王)亡于周。纣的都城文献中记为“朝歌”,其地在今河北淇县,距安阳小屯很近,可能是殷都的别宫,并非又一次迁徙。盘庚以前的屡次迁徙,具体地域现在不能肯定。大概那时殷人的势力尚未达到全盛,内部的问题和外部的压力迫使殷部族经常迁徙。盘庚迁殷以后,殷人的势力渐渐达到全盛。盘庚之侄武丁,在位 59 年,是一位伟大的中兴帝王。传说武丁得圣人傅说辅佐,修政行德,使商的政治步上轨道。武丁对外用兵征讨不服,武功显赫。从卜辞记载看,用兵的重点是在西北和北方,那里有几个大的方国,如鬼方、羌方、土方等,它们的或叛或服,往往是衡量商人势力盛衰的晴雨表。武丁时商人势力强盛,方国从属的盛况,后世多有追述。如孟子就说:“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公孙丑上》)商王国经武丁振兴,至纣王灭国,达 200 年之久,是一个稳定的、有较高文明的大国。现在史学界所知商代的政治、文化、社会状况,基本都是武丁以后殷都时代的。

商人都殷以后,其直接统治区在今黄河中下游一带。商人政治势力扩及的范围则要大得多。见于甲骨卜辞记载的有几十个方国,这些方国地处商王直接统治区域之外,是独立或半独立的地方政治势力,承认商王的统治。这种统治的性质究竟如何,是一种国家体制下的从属关系,还是部落军事联盟的关系,学界至今仍有不同看法。但不论哪一种性质,殷都都是包括整个华北、长江流域,以及西至陕、甘在内的广大区域的政治中心。殷墟出土的宫殿遗址、城市遗址,拥有大量珍贵随葬品的大型墓葬,精美的青铜器,几万片刻有发达文字的卜甲卜骨,都表明这里聚集四方物资贡赋,长期经营,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

周人兴起于西部,考古上发现的先周文物多在关中。先周民族为何种语系,现在仍不明了,可能是由北方草原转向关中平原并学会农业的民族。《诗经·大雅》中有一组周人史诗,记述周立国前先公先王的故事,有弃(后稷)、公刘、太王、王季和文王,其内容当是来自周人世代口耳相传,有一些史实的根据。周人东向灭商是在公元前 11 世纪,这是周人自太王开始历经几代的奋斗过程。太王迁岐,王季开疆,文王统一西土,武王伐商,周公东征,成王时东征完成,周人确立新的王朝统治前后约经五代。

周人能够打败商人,原因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周人建立了较坚强的内部组织,联络了西土的许多部族,组成一个强大的联盟,几代首领艰苦努力,生气勃勃,这在周初的文献里都有记载;另一方面就是商人部族的内部矛盾日益严重,最后几代商王都无力处理好这个问题,以至武王伐商时,东部诸多商人部族袖手旁观,最终被周人分化瓦解,各个击破。关于商族的内部矛盾,甲骨文研究已经能寻到踪迹。

周人克商以后,几乎全部继承了商人的文化,诸如礼仪、文字、艺术、青铜器及铸造技术,甚至某些宗教观念。这一事实古人就知道,孔子称为“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现代考古学基本上确证了这一点。这一事实非常重要,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氏族地方文化转向中国文化的开端。殷人是东部民族,周人是西部民族,他们有不同的种族渊源和传统礼俗。周人征服殷人,采用殷人的文化礼仪来表达自己的统治权,表明不同地区、不同文化渊源的民族已经认同一个共同的文化体。这一变化是如何形成的,还有待研究,但“周因殷礼”显然表明一个超越地方集团的连续的文化系统已经出现,这文化系统就是中国文化的初始。

周人继承了商的文化,政治制度却与商代有很大的不同。商虽为王国,王畿之外的众多方国却基本自治,只是承认商王的宗主权。这种政治控制是不稳定的,所以商代经常有与方国之间的战争。西周初年,周人在克商以后退回西土,原是沿袭商的统治方式。可是广大东土的商部族却在武王去世以后发动反叛。此时成王年幼,周公秉政,周人发动了大规模东征。东征历时三年,打败和征服了东方的众多方国,周公规划新的统治构架(此即“周公制礼”的由来),在军事征服的基础上分封新的邦国,取代原有方国。这就是著名的封建制度。周初封国约在百数,遍布东方战略要地和肥沃的农业区。封国统治集团大部分是周王室子弟,少部分是周人的同盟姜姓,以及愿意臣服的东方大族,包括商人。分封的结果形成了新的统治网络,商代的方国被周的封建国家取代。尽管西周还有为数众多的土著邦国,封国并没有控制王国全境,他们只是占据近百个点状的城邑和附近郊野,但这些城邑构成周的统治网络。中国古代第一次实现上层政治组织的统一。中国历史由地方自治的氏族社会演变到统一行政帝国,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周初分封是这个过程的第一步,秦灭六国是这个过程的完成。

周的封国以王室子弟为主,如鲁、卫、晋等,这些同宗封国把周人的宗法网络扩展到王国四境,使宗法制度成为周的统一上层制度的核心。周的政治制度不仅得力于宗法组织,而且得力于若干氏族群体的合作。姜姓宗族是周人世代同盟,姜姓封国如申、吕、齐等占据中原中部和东部要津,与周族子弟一样成为王室藩屏。商族人数众多,其中部分商族组织降服周人,还有其他东方旧族如妘姓、姁姓等也愿意与胜利的周人合作。这些氏族的上层成员,有的由西周分封建国,如宋、陈等,成为周的统治网络的一部分,有的迁居王畿和洛邑,成为西周世官,有的作为合作者,迁居到周姓封国,如鲁国初封时配有殷民六族、卫国有殷民七族,晋国有怀姓九宗等,日后都成为这

中国古代史研究导引

些邦国内有地位的国人或贵族。周人怀柔政策下的氏族合作不仅消弭了东方氏族潜在的反抗力量,而且把原先分隔的东西方氏族混合在一起,政治上合作,文化上相互交融,为春秋战国时代华夏民族的形成作好了准备(参阅选文部分《共同的西周经历》)。

西周由分封制奠定立国基础,宗法成为网络整个王国的制度,逐渐在成、康以后建成稳固的秩序。成、康、昭、穆、共、懿数世,西周进入全盛时代,这是后世所说的“礼乐文明”形成的时代。“礼乐文明”对春秋战国以后的政治文化影响深远,需要了解一下其主要内容。“礼乐”有一部分源自氏族村社的礼俗,但是已经与民间礼俗有实质的区别,它是贵族的礼仪。“礼不下庶人”,礼仪与庶人是没有关系的。在氏族政治时代,享有政治权力的氏族要用礼仪来象征它的身份和权力。考古发掘和文献记载都表明,古代王族和贵族往往集中大量物资构造象征权力的仪式系统,如新石器时代的玉器,青铜时代的青铜重器等等。祭祀礼仪是贵族礼仪的核心,此外还有其他重大场合的礼典,如赐命、朝王、宾客相见、宴饮等等。这些礼仪各有身份的讲求和层级的划分,本身就有维护政治秩序的意思。但西周以前的政治,商王与方国之间的统治权,主要凭武力,很少凭借礼仪象征。西周成康以后,随着分封制的建立和上层政治网络的形成,王国与封国之间的统治关系,逐渐成为主要凭借礼仪的象征,此一制度转变促使礼乐文明大为兴盛。“礼乐”之礼为礼仪,乐为乐舞,乐舞本身是礼仪的一部分,祭祀、赐命、朝觐、宴享,都配以礼仪乐舞,规范各级贵族的地位身份,维护从周王到封国邦君的统治权。西周贵族原先都是孔武有力的战士,成康以后战事渐少,礼仪繁盛,贵族重视仪式乐舞,逐渐培养成文雅的气质。这种贵族的文雅风尚,既是西周政治的维持力量,也是日后儒家文化的源头。

西周的衰败始于厉王时代的财政危机,危机导致王室与贵族之间矛盾日深,公元前841年终于爆发国人暴动,赶走周厉王。国人暴动决不会是平民反抗统治阶级的暴动,否则结果不可能是“共和行政”。暴动的背后应是有贵族的策动和主持。此后虽然又有宣王中兴,一度稳定局势,但西周制度的内部矛盾已经不可化解。这矛盾导致西周上层势力内部分裂,无法抗拒西方和北方游牧民族的进攻。公元前771年,申侯、缯和犬戎联合攻入西周王都,杀周幽王,西周灭亡。

中国文明的起源

夏 鼐

导 言——

本文选自夏鼐《考古学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夏鼐(1910~1985),浙江温州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曾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

本文写于1980年代,全面考查了20世纪考古学探究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所取得的进展。作者指出,在全世界的六个古文明中,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文明是相互影响的。美洲的墨西哥文明和秘鲁文明与旧大陆无关,是独立发展的文明。唯有中国文明的起源,是受近东文明影响发展起来,还是独立演化形成,学术界有激烈的争论。作者介绍了安阳殷墟文明,分析了它的都市、文字、青铜器,又介绍分析了此前的郑州二里岗文化、偃师二里头文化及若干更早的新石器文化,最后提出,中国文明主要是自身独立地发展起来,但不排除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一些外来影响。

文明起源的早晚

“文明”一词,在中国文献中最初见于《易经·文言》中“天下文明”。孔颖达疏:“有文章而光明也。”现今汉语中用它来翻译西文中“Civilization”一字,指人类社会进步的状态,与“野蛮”相对^①。摩尔根—恩格斯的社会发展史学

① [作者补注]今本《尚书·舜典》中,有“浚哲文明”句,论者或以为较《易经·文言》传为早。但今本的《舜典》篇,为东晋孔传本从《尧典》中分出者。据近人考订,其成书当在战国时代。《舜典》中,开始的二十八字(其中包括“浚哲文明”四字),实为南朝齐建武四年(497年)姚方兴奏献本所附加的(参《十三经注疏》本《舜典》篇孔颖达疏及陈梦家《尚书通论》第71~72、112页)。因此,《舜典》篇的“文明”两字,较之《易·文言》传的时代为晚。关于《文言》传的年代,一般以为应是西汉初期的著作。马王堆三号墓(西汉初年)出土的《易经》未见《文言》传。汉字“文”与“明”两字连缀一起构成一个词组,恐不能上溯到先秦时代。(编者按:本文是作者1983年在日本所作的一次演讲,1984年出版演讲稿的日文版,由日本学者加注。1985年中文版出版时作者加若干补注。)

中国古代史研究导引

说^①(Morgan-Engels Theory)将“野蛮”分为“蒙昧”与“野蛮”两时期,和“文明”时期合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三个时期。人类从野蛮时期的高级阶段经过发明文字和利用文字记载语言创作而进入文明时期。

现今史学界一般把“文明”一词用以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这种社会中,除了政治组织上的国家以外,已有城市作为政治(宫殿和官署)、经济(手工业以外,又有商业)、文化(包括宗教)各方面活动的中心。它们一般都已经发明文字和能够利用文字作记载(秘鲁似为例外,仅有结绳记事),并且都已知道冶炼金属。文明的这些标志中以文字最为重要。欧洲的远古文化只有爱琴—米诺文化,因为它已有了文字,可以称为“文明”。此外,欧洲各地的各种史前文化,虽然有的已进入青铜时代,甚至进入铁器时代,但都不称为“文明”。

英国剑桥大学丹尼尔教授^②(G. Daniel)在1968年曾认为全世界最古老的独立发展的文明是六大文明:埃及、两河流域、印度、中国、墨西哥(包括奥尔密克文化和马雅文化)和秘鲁。前两者是有互相影响的关系,这有考古学的资料为证。印度河流域和两河流域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荷兰著名考古学家法兰克福(H.

① 摩尔根—恩格斯的社会发展说。美国人类学者路易斯·H·摩尔根(Lewis H. Morgan)于1877年发表了所著《古代社会》一书。书中将人类社会的发展,按照其生活资料来源的扩充,分为蒙昧、野蛮、文明三个阶段(在日本,也有译作野蛮、未开、文明的)。而对于前两个阶段,又分别细分为下层、中层、上层三期。即:

蒙昧下层期——人类幼年期、植物采集;
蒙昧中层期——使用火、鱼食;
蒙昧上层期——发明弓、肉食;
野蛮下层期——制作陶器;
野蛮中层期——饲养家畜;
野蛮上层期——铁矿的提炼;
文明期——发明文字。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恩格斯,于1884年著《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一书。他以摩尔根的人类文化发展的阶段为基础,更加以婚姻形态,提出社会发展的三阶段说。即蒙昧期为集团婚,野蛮期为对偶婚,野蛮上层期为一夫多妻婚和文明期的一夫一妻婚。此书,为马克思主义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

② 格林·丹尼尔教授(Glyn Daniel)为英国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考古学人类学研究室的主任研究员,并兼任尤尼巴西特学院(University College)的考古学讲师。专门研究西欧和地中海地区的巨石纪念物和先史美术,对于考古学史也是造诣甚深的。他还是《古代》(Antiquity)这一专业性杂志的编辑人,并且是电视广播的主持人。在他所著的《最初的文明:关于文明的起源的考古学研究》*The First Civilization: The Archaeology of the Origins* (Thames and Hudson, 1968)坂本完春译为日文,改题为《文明之起源与考古学》(现代教养文库)一书中,指出了美索布达米亚、埃及、印度河、中国、墨西哥、马雅为六大文明起源之说。以前,一般的说法是,世界的古代文明是在大河流域独自发生的。但根据考古学的资料,作者主张,这些文明之间是依靠互相接触、刺激的联合作用,而产生了文明(坂本完春[译者书后])。

[译者补注]丹尼尔于1974年任剑桥大学考古学教授,1981年退休。